

23.10.

22-



昌吉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84

政协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
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yt197/35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4年10月·昌吉

封面设计 刘柏林

责任编辑 余骏升

昌吉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昌吉州印刷厂印刷

(内部发行)

开本32开 字数11.4千

1984年10月第一版 198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工本费：0.60元

目 录

文 史 资 料

- 难忘的延安之行 张伯春
呼图壁县长徐文彬被判处死刑始末记
..... 许太何
奇台县教育今昔概述 李长荣
匪首乌拉孜拜覆灭记 寇长青
吴来者妖术惑马山 赵福宝
徐学功与马桥子城史略 李长青
从八百里秦川到天山南北——西北土改工作团
回忆 石磊
孚远县城保卫战侧记 扈九
天亮前迪化教师的一场罢课斗争
..... 刘鸣凤
南山剿匪记 袁学凯

人物

- 我见到的毛泽民同志.....郭淑玉
董率真在木垒活动点滴.....韩森林
米泉回族民歌手韩生元.....扬杰
马良骏大阿訇被捕入狱始末.....张福善

地方历史沿革

- 天山脚下的历史名城——北庭.....王秉诚
玛纳斯县的名称由来简述.....闫锡连
米泉的历史沿革.....郝铭巍

名胜古迹

- 昌吉县大佛寺的变迁.....王建江
吉木萨尔县千佛洞.....鲁连夫

史话·资料

- 商源追溯——古城子商业史话之一

.....周海山

阜康白酒的兴衰.....何肇兴

昌吉近代史(1840——1921)大事记

.....资料室

难忘的延安之行

张伯春

延安是革命圣地，在黑暗的旧中国，她是被压迫人民的灯塔，那时多少人向往她，然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干挠，许多人想到延安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抗战期间，我先后两次去过延安，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事。

一、难忘的旅程

一九三七年，我在新疆运输局汽车队当队长。这年冬季的一天，盛世才要我率领车队把新疆各族人民捐献给抗日前线的寒衣送到延安。当时盛世才伪装革命，执行亲苏联共的政策，他为了显示支持抗日，亲自安排运送物资。他从督办公署派任国治作车队指导员，任国治二十八、九岁，仪表英俊，办事机敏干练，口才也很好，他专门负责押车，办理物资的交接，排除沿途关卡阻力。我作为队长专门负责技术方面的事，组织行车驾驶与维修汽车。我们的车队共二十辆大卡车，车上满载着库车产的二毛皮筒子羊皮大衣。我们出发后，从迪化到猩猩峡，一路平安无事。可是到猩猩峡，被哨卡挡住了。他们看了任国治持有的督署通行证件，仍然检查了全部车辆。进入甘肃境内，到了安西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我们车队休息时，夜间当地伪军把两捆皮大衣偷走了。任国治束手无策，最后向延安发电报请示。回电说：丢了就算了，不必再追查了，赶路要紧。我们忍痛离开了安西，穿过河西走廊到达兰州。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吴处长接待了我们，并说：“兰州情况复杂，车队不能停留，要迅速离开，以防引起

磨擦。”在抗战中，后方人民给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捐送寒衣，本来是正大光明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口头上也说团结抗日，实际上反共限共，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路上的经历，使我们进一步看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我们离开兰州，车队进入陕西，到达彬县时又遇上麻烦。那天晚上，我们的车停在城墙跟，被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他们无事生非，不放我们通行。任国治去交涉，费了好些唇舌，还设宴请了城防官吃了饭，这才放行。车到咸阳，又被驻军挡住不让通过，最后，我们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面交涉后，车队才得以放行。到洛川后，马家部队又挡住了去路，这个部队的头目不知是什么官衔，其部下都叫他马三爷，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山大王。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又出面交涉后，才顺利通过。一过洛川就是解放区了。我们车队一进入解放区，就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欢迎我们的干部、战士、学生和群众，排列着整齐的队伍，唱着抗战歌曲，呼喊着“欢迎新疆工友张伯春、任国治同志”，“向新疆工友代表致敬”的口号，气氛非常热烈，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人们隆重接待，我们笑在脸上，热在心里，感到为抗日出点微力是无上光荣的。车队进入解放区后，在去延安的途中，凡是有村镇的地方，都有人迎送我们。到了距延安三十公里的地方时，延安还专门派人迎接我们。就这样我们的车队历尽了艰难曲折，终于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二、在延安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延安城是一座雄伟的山城，宝塔山屹立在城侧，延河水翻滚着浪花。我们住在招待所。当时延安的生活比较艰苦，人们的日常饭食是小米粥，可是每天给我们吃白面。延安时已是隆冬，每间房子取暖按二斤木炭的标准供应，可是首长怕我们受冻，不限量供应木炭。我们提出要和战士们吃一样的伙食，接待我们的同

志说：“你们从新疆来到这里已经吃苦了，不必强求一致。”最使我难忘的，我们到延安不久，在枣园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是在他住的窑洞里接见我和任国治的。当工作人员领着我们走进毛主席在枣园的小院时，小院的整洁干净就使我们感到舒心。我们看到沿山坡的几孔窑整齐的排列着，都是一门一窗。从外表看和当地民间窑洞一模一样：简单、朴素、坚实。进了窑洞，顿时感到周身温暖，象是春天似的。我向室内环视了一下，看见屋内的陈设同样很简单：一张供休息的床、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木椅子，墙上挂满了地图。在办公桌上有笔、砚、文稿、茶具和一盏石油灯。从这简单而朴素的陈设中，可以想象得到：为了全民抗战的胜利，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他老人家是在呕心沥血，昼夜不息的工作着。当我们向毛主席问了好后，毛主席向我们表示慰问，详细地询问了沿途的情况。我们一一作了汇报，毛主席频频点头表示满意。他还和蔼的嘱咐我们好好休息。当天专门为我们举行了丰盛的宴会，张国焘参加了宴会。他说：“我代表毛主席来陪你们吃饭”。

我们车队的二十辆汽车，全是苏制3UC—5型车，这种车通称羊毛车，是新疆人民捐献给延安的。那时延安从各地调来的司机都是生手，我留在延安当了三个月教练。而且当我们全体返回新疆时，还留下了八位同志在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如朱占奎同志，在我二次赴延安时，他已经被培养成文化干部了；汽车驾驶员阎盛奎同志后来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开车，……都成了为人民服务，为民族解放而战斗的革命者。

三月份，我们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给我和任国治每人赠送了三百元钱，给驾驶员和副司机每人伍拾元。我们知道八路军的经济不宽裕，都推辞不收。可是毛主席诚挚和蔼地说：“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一点心意”。盛情难却，我们只好愧领了。

当我们要离开延安，踏上返回新疆的征途时，八路军各机关

部队、学校和群众又来欢送，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延安。

途经西安时，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我在那里和周彬同志见了面，他对我说：“我要去新疆工作，到了那里我们就是同事了，希望你能和我们团结合作。”我觉得他和蔼可亲、坦率诚恳，不知道他就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我回到新疆后，不久他就担任了省财政厅长。他提拔我当了交通局的科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凡是由他主持召开的有关交通运输方面的会议，都邀请我参加，而且凡是我提的建议，他都采纳。那种知人善任，重视培养干部，和放手使用干部的作风，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三、送“新兵营”将士返回延安

一九三九年冬天，盛世才又令我组织一个车队，送“新兵营”将士回延安。我接到这个命令后，既高兴又忧愁。高兴的是第二次去延安，又能见到共产党的领袖毛主席，和在革命圣地的抗战英雄。忧愁的是：当时新疆汽车数量不多，大都是破烂不堪，要组织一个五十辆汽车的车队，确实是不容易的。我想运送红军战士到抗日前线，是件光荣的任务，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时新疆交通局长盛世英（盛世才的弟弟）是个吃喝玩乐的饭桶，他对这么重大的事，竟撒手不管。我便全力以赴，组织去延安的车队。

“新兵营”方面，由饶子健、宋承志等同志率领，大约有七百人，都带着武器和简单的行李，分乘在五十辆羊毛车上。车队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起程向延安进发。“新兵营”是长征的西路红军，一九三七年进入新疆。他们在新疆期间，分别学习了汽车、装甲车和坦克车的驾驶技术，以及炮兵、通信和工兵等军事技术。现在这批将士奉命回延安。

送“新军营”回延安，盛世才派了一个少将军衔的参议护

送，此人名叫丁宝珍，是个沉着干练，有阅历，遇事能随机应变的人，沿途走州越县，闯关过卡，都是由他出面洽谈，因而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随行的还有叫陈海山的随从卫士，他是盛世才派驻“新兵营”，专门负责传递“新兵营”的方先生（张按即邓发）与盛世才之间来往公文信件的。他为人憨实，能吃苦耐劳，一路上为完成护送任务出了不少力。

为了避免在国统区发生意外，汽车队一出新疆，就进行了伪装，用篷布把车厢围得严严实实。“新兵营”战士们纪律非常好，没有命令不下车，在车内不说话，不咳嗽，所以在车外一点声音也听不到。汽车路过城市，都在夜深人静时通过。经盛世才允许，新疆还派了两架飞机，由方先生乘坐，沿途予以照应。车队在兰州住了几天，战士们进行休息，驾驶员检修汽车。经过几天运行，总算到了西安。我们的车子都是老掉牙的羊毛车，经常抛锚，幸好全体驾驶人员能够通力合作，才平安的到达西安。为了解决缺油问题，对汽车进行甄别，挑选了二十辆较好的，便载人继续前进，其余的三十辆暂时停在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另派了几辆汽车，共同完成运兵任务。

我们到达延安，正是除夕晚上，到处是节日的气氛。第三天，八路军总部开了大会，欢迎回到毛主席身边的红军战士。当晚，八路军总部又开联欢晚会，会前，毛主席接见了我们，并做了简短的讲话。由上海到延安的“左明”剧团演出，大幕拉开时，舞蹈演员列队亮出了手执的大字牌：“欢迎新疆工人同志来延安”、“欢迎新疆代表和参议”，气氛热烈，掌声雷动。剧团演出了大型话剧《日出》。

在延安约住了三个月，对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官兵一致、军政团结，没有压迫剥削，见不到啼饥号寒，到处是学习、生产、练习习武、生气勃勃的景象。在此间，毛主席派人给我们赠送了他的照片，还有很多马列主义书籍。记得有《斯大林选集》、《唯

物史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论持久战》等。这些珍贵的书籍，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二年直到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公开屠杀共产党人时，才被迫焚毁。

从延安回到迪化

我们要回新疆没有汽油。我就去找毛主席。毛主席问我们有什么办法？我说，想试用煤油代替。毛主席答应让我去试。试验结果勉强可行。于是，延安给我们准备了一部分煤油，每辆车配发四、五斤汽油，供点火用。我们便离开了延安，踏上了回新疆的征途。车队走出延安不远，遇到一批从延安向三原行军的红军队伍，有好几百人。一位军长（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姓名）同志前来找我说，他们是去山东的新四军部队，徒步行军到三原车站，才能搭上火车，想要搭我们的车。我知道车烧煤油，本来就轰不起来，如果载重，就更加困难了。但是一看到，那些抗日健儿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搏拼的献身精神，便毫不犹豫地答应道：行！我向那位军长同志作了说明，要求他们合作。果然汽车烧煤油，光冒黑烟，跑不起来。我觉得成问题，和军长商量，请他把车况向战士们讲清，要求配合。军长提出，上坡时，大家下来推车，到平路或下坡时，再坐上去。在取得了战士合作后，行行停停、停停行行的，总算到了三原，那位军长同志在三原备饭招待了我们。

当我们经过西安兰州等地时，那里八路军办事处都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风和日暖的春天，我们满载着党中央毛主席和边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回到了迪化。

陈芝兰、石磊记录整理

呼图壁县长徐文彬被判处死刑始末记

许太何

一九三三年四月，在新疆省城迪化发生了政变，金树仁政权被推翻，盛世才窃取了新疆政权，登上了新疆督办的宝座，为了欺骗新疆各族人民，他颁布了包括“铲除贪官污吏，厉行清廉政策”在内的《四·一二八项宣言》。一九三四年六月间，呼图壁县农民因忍受不了贪官污吏及封建势力的压榨，选派我为代表，到省城迪化向当局检举告发了前任县长广钧及现任县长徐文彬贪赃舞弊及渎职殃民的严重罪行，经过了一番曲折反复地斗争，得到了地下党人张义吾（任新疆省保安总局局长）、王立文（《新疆日报》社编辑长）等人的积极支持和帮助。由保安总局出面派员到呼图壁县彻底清查徐文彬舞弊贪赃，渎职殃民的具体犯罪事实，另一面又在《新疆日报》上公开揭露了他们的各种不法罪行，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在这种形势的逼迫下，当时的新疆省政府及边防督办公署不得不联合组成以保安总局局长张义吾为庭长，以督署军法处处长冯梁及迪化法院院长程东白为付庭长，以保安局付局长哈的尔阿吉为审判长的“新疆临时特种法庭”，于一九三五年二月间，前往呼图壁县，在当地开庭公审。根据徐文彬的各种严重犯罪事实与本县人民的强烈要求，按照国家刑法和本省“惩治贪污条例”的有关条款，将现任县长徐文彬当庭判处死刑。并即于二月二十一日，在呼图壁县东校场刑场执行枪决。

这在呼图壁县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政治事件，而且在新疆也是自建省以来空前的壮举，一时轰动了全省。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但还有人谈论它，也有些人直接向我打听这个事件的真象。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一日，我应邀参加了自治区政协征集文史资料座谈会，在会上禹占林副主席曾嘱咐我把这段历史资料写出来。会后有几位同志来怂恿鼓励，要我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由于存在许多复杂的原因，我一直未动笔写过。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对当时新疆政治历史问题，至今尚未做过明确的结论，我写出来，只怕有人做随心所欲的解释，招来新的麻烦。而且我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悬而未决，如果把这场政治斗争写出来，有人会说这是自吹自擂，宣扬自己，为个人树碑立传，还不如不写为好；再者，这一事件发生距今已有五十年的时间，我现在年事已高，记忆衰退，又无处去找到参考资料，只凭自己的记忆，写这个历史事件真相的资料实在有些勉强，所以我很久就没有动笔。

一九八三年，呼图壁县志编修委员会派人到乌市找我，敦请我无论如何要把这段史料写下来。这是呼图壁县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他们还说了老实话，是怕我把这段史料带进火葬场，所以要来“抢救资料”。

我自幼生长于呼图壁县，食茅践土，桑梓深情。为了不辜负家乡人民的深情厚意，我只好硬着头皮，凭籍个人回忆，动手写成这篇始末记。至于如何对它进行修饰润色，以至艺术加工，只有另待高明了。

一、战乱中辗转挣扎的农民

新疆在杨、金反动统治时期，政治黑暗腐败，官吏贪污成风，“千里路上做官，都是为了吃穿”，几乎成了人们的口头语。有些人贿通门路，到处求官，一旦当了县长之后，便把管辖的县看成为受封的采邑一样，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当过一任县长，多是腰缠万贯，满载而归，回到省城修公馆，买婢妾，花天

酒地，过着醉生梦死，寄生腐朽的荒淫生活。因此他们把当县长看成发财的捷径，徐文彬就是在这种腐败环境中混入官场的。听说他先后在阿克苏及昌吉两县任县长期间，贪赃枉法，臭名远扬，当地人民对他的行径无不切齿痛恨。呼图壁县长广钧也是依靠吮吸人民的血汗，养肥自己的脏官。这两人一前一后，剥削压榨广大农民群众，他们都同本县农民结下了血海深仇。

一九三〇年，哈密农民暴动，接着是马仲英率部进入新疆，至一九三二年底，动乱扩展到全疆各地。金树仁为挽救即将崩溃的局势，竟挑起民族间的互相仇杀。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间，金树仁派李作梯率领约有八百人的部队到呼图壁县驻防。当时马仲英部马世明率其部属，流窜到呼图壁南山石梯子一带活动。当地三百余口无辜的汉族农民尽遭屠杀。呼图壁城郊周围各乡农民闻风十分惊慌，有些弃家逃入城内。城东白格达、东滩、十四户、头工一带农民大半都聚集到十四户，下头工一带观看动静。这时，我家也离弃了家乡，和大家在一起注视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我自幼生长在呼图壁县农村，在当地上学长大，后来在省城师范学校毕业，被派到呼图壁县当小学校长。因不满县府尖斗收粮，勒索农民，痛骂过粮仓收粮人员营私舞弊，被广县长叫去狠狠训斥了一顿，并警告我再不许多营闲事。我非常气愤，便立即辞职，回家务农。目前由于马仲英部的骚扰，形势紧张，广县长派衙役催赶逃难的农民速去守卫县城。在这样的寒天里，农民进城食宿取暖，车马牛羊等问题，都无法解决。大家选我当代表，进城申诉这些具体困难，竟被广县长破口大骂了一顿。他说：

“你们都该死！眼看刀就砍到脖子上了，还舍不得牛牛子、羊羊子。要想活命的马上进城，不进城的就让土匪杀尽，也没人管！”我回来把他的话转告给大家，农民都感到气愤，一时谁也拿不定主意。我说，“决不能进城，为这些赃官当殉葬品；更不能俯首贴耳为他们守城买命。我们要当机立断，马上组织自己的武

装力量，保护男女老幼，车马牛羊，立即离开此地，去城北芳草湖一带与当地农民兄弟汇合，共同闯出一条生存的道路”。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和主张，组成了农民自卫团，推选我为团长，编成三个自卫队。当下传令各队迅速准备，连夜向城北芳草湖方向前进，若官府阻拦，立即对抗。一路经过下头工、三宫、老哇窝、土墩子，渡过呼图壁河到达梧桐窝子。由于当时天冷，住宿食用取暖方面都很困难，经商议决定把全部人员车辆等分成三队，一队经十三湖到大小泉，一队经中渠、渭湖、真番户到单摆，一队留在梧桐窝子与当地农民兄弟汇合。依靠农民兄弟的共同努力，这一部分流离失所的人们有了暂时的安身之地，生活相对稳定下来。

在这段时间，我差不多走遍了呼图壁县城北、城西的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以及他们对贪官污吏憎恨的情绪。我向他们表明，坚决反对金树仁挑动回汉相互仇杀的反动阴谋，提出了“不分回回与汉人，要杀国贼金树仁”的口号，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在我从单摆回到梧桐窝子以后，听说广县长又派来一名衙役来到这里，传令：“所有从县城周围流落到这里的外乡人，一律限期回城，否则就要严加惩办”。这里的人不听，反而将这个衙役绑到苇湖枪毙了。不久又听说，金树仁几个官兵窜到了芳草湖下湖、五户地一带奸淫抢劫，被当地农民击毙，将枪夺下，农民反抗情绪是相当强烈的。

我们不断派人到城里去察看动静和探听消息。有一次，梧桐窝子农民杨忠文和几个人到城里，被官兵发现而抓获，他带的一支连珠枪也被没收，并罚他每天跟广县长、殷生寿的民团到各乡搜查民间粮食。后来他趁机逃回，还带来一支步枪。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底，我同三四个人乘马到城里去探听消息。一到北城门口，看到许多人围聚在一处，观看张贴在城门

墙上的大幅布告，才知道金树仁已被推翻，省城已成立了新政府。在附近还张贴了用红色油墨铅字印成的《四·一二八项宣言》其中有“避免战争，维护和平”、“各民族一律平等”、“铲除贪官污吏，厉行清廉政策”、“实施农村救济，恢复农业生产”以及“反帝”、“亲苏”的纲领等等。我看完之后，感到了由衷的喜悦，这是因为金树仁被推翻，全省的危险混乱局面可望得到解救；解除了金政府向我们兴师问罪的威胁，贪官污吏失去靠山，再不敢为所欲为；地方暂时平静，民族间相互仇杀的流血惨剧可基本停止，新政府要实施农村救济，恢复农业生产，大家可回到自己的家园，重新进行生产和安排生活，颠沛流离的日子也就快要结束了。我回到梧桐窝子，立即与大哥及杨忠文等人乘马去大小泉及芳草湖中渠，单摆一带找到流落在这里的人家和当地住户，把省城发生了政变，金树仁反动政府被推翻，新政府《四·一二八项宣言》的内容详细告诉大家，宣布农民自卫团自动解散，要大家早日返回家园恢复生产。此后，农民陆续回到家乡，在被官匪抢劫得一无所有，满目荒凉的废墟上重建家园，安排生产和生活。

在我们离开家乡时，广县长为了惩罚和报复，劫夺民间财富，把城郊各乡尚未流动的农民一律驱赶进城，并指派本县恶霸殷生寿为团长，组成民团，白天挖战壕，夜间守城墙。广县长命殷派出大车二百余辆，由民团保护，每日分赴各乡，将农民家中所存粮食，如大米、小麦、高粱、豌豆、芝麻、胡麻等一律拉运到城内各处存放。这样连续拉运了一月有余，据估算被抢走的粮食约在四万石左右（每石约合四百市斤上下）。这些粮食大部都堆放在殷生寿当铺后院，由殷保管，变为广、殷的私产，不许外人挪动。

金树仁政府垮台，新政府成立，战乱基本已平息。农民回到家乡，既无粮食，又无籽种，生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各乡农民又选我和其它几个农民为代表，到县府请求广县长将拉去的粮